

戰後初期楊逵的社會運動及政治參與

黃惠禎*

摘 要

楊逵是台灣史上知名的文學家與社會運動家，目前學界對他在日治時期領導農民組合的事蹟已頗為了解，惟獨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以往的研究大多迴避二二八事件等敏感性的政治禁忌，導致楊逵在戰後初期的活動情形至今未明。本文主要藉由第一手史料與楊逵親友的回憶，勾畫戰後初期楊逵積極投入建設新台灣，從領導或參與組織解放委員會、新生活促進隊、民生會、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政治建設協會等團體，到二二八事件期間毅然走向武裝革命，以及出獄後支持學生民主社團麥浪歌詠隊，起草〈和平宣言〉的各項經歷。了解楊逵如何因應戰後的變局重新出發，及追求台灣自治與堅持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精神面向。

關鍵字：二二八事件、麥浪歌詠隊、楊逵、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戰後初期

* 作者為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Yang Kui's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Post War Period

Huang, Hui-Chen *

Abstract

Yang Kui is a well-known literary author and social movement leader in Taiwan history. It has been very well known in academic circles that he led Peasants' Organization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However, under the shadow of White Terror, most past research has avoided the sensitive political taboo of the 2/28 Event so that Yang Kui's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was unknown.

By means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the memories of Yang Ku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is essay will draw the outline of Yang Kui's variety of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whi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construct a new Taiwan, led or participated the Liberation Committee, the New Life Promotion Team, the Livelihood Association, the Taichung City head quarters of the KMT, the Relief Committee of Taiwanese Revolution Martyrs' Descendant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2/28 Event, he resolutely undertook armed revolution.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jail, he supported the "Wheat Wave Song Team" – a student democracy society, and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of Peace. This essay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how Yang Kui dealt with the changing postwar situation, restarted, ran after Taiwan Autonomy, and persisted in Taiwan-oriented culture.

Keywords: 2/28 Event, the Wheat Wave Song Team, Yang Kui, the Relief Committee of Taiwanese Revolution Martyrs' Descendants, the Early Post War Perio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一、前言

1945年8月15日，殖民母國日本的敗戰投降，為台灣開啟全然不同的政治新局，各地迅即掀起一波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的風潮。除了三青團的成立與中國國民黨在台設立黨部之外，昔日被殖民政府彈壓而消聲匿跡的抗日團體亦紛紛展開重組。1975年9月20日，台共謝雪紅在台中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10月5日於大華酒家正式成立。10月20日，「台灣農民協會」也在台中組成，當日參加代表130餘人，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因各地自動成立支部，會員成長到一萬人以上。十月間，台北學生發起組織的「台灣學生聯盟」於台北中山堂成立。10月20日，工人階級在台中討論組成「台灣總工會籌備處」。¹中國政府來台辦理接收之前，各階層民眾重建台灣的熱情瞬間點燃，社會運動蓬勃一時。

成名於日治時期的作家楊遠也是台灣史上知名的社會運動家，面對戰後政權遞嬗的歷史轉型期，理應不會在台灣知識菁英的參政熱潮中缺席。然而生前時常津津樂道對抗日本殖民政府英勇事蹟的楊遠，卻鮮少提及戰後初期的親身經歷，就連記述其生平最為詳盡的《楊遠畫像》，有關戰後初期楊遠活動的記載也極為簡略，牽涉到政治敏感話題的部分更是幾近空白。²其中原因不外乎曾經身為政治思想犯的特殊遭遇，雖然因緣際會得以在鄉土文學尋根熱潮中復出，威權體制之下還是盡量避免觸及當局的禁忌，以免招來無謂的政治干預。³由是之故，楊遠在回憶中觸及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經歷者，也只有王麗華

1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112-118。

2 《楊遠畫像》將有關楊遠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簡短描述為：「台灣是光復了，然而不幸新的現實矛盾亦逐漸形成。36年楊遠與葉陶一度在歷史的悲劇中被捕下獄」；1949年楊遠被捕入獄一事，則以「38年全省動亂，楊遠的文學生涯亦因之不幸中斷」輕輕帶過。之後，楊遠拘繫綠島監獄一事甚至隻字未提，而以「民國50年4月6日楊遠終於解脫了一場長久的夢魘，葉陶懷著興奮的心情去接他回到熟悉的故土」，來形容楊遠服刑期滿回到台灣。以上分別見林梵（林瑞明），《楊遠畫像》（台北：筆架山，1978），頁147、153及頁155-156。

3 楊遠生前雖然曾經表示：「二二八事件以來的種種事情，漏掉沒有寫的，還有許多許多。我既然特意搞的是文學，通過文學，我來把要說的話說出來。40到80之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的一切寫出來。」（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遠的七十七年歲月——1982年楊遠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紀錄〉，《文季》1卷4期，1983.11，頁30。）戰爭結束時楊遠正值40歲，雖然晚年有心要把戰後發生過的事以文學的方式公諸於世，但在他生前始終未能寫成。1982年楊遠接受何昫訪問時，暢談二二八事件前後的遭遇，提及戰後兩度入獄都有法官神秘註銷他的罪證，始能逃過殺身之禍，並說如果再公布這些事情，他會再去坐牢。楊遠去世後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何昫才公佈三年前整理的這篇訪談記錄。另

筆記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與何昀錄音整理的〈二二八事件前後〉兩篇口述記錄而已，並皆遲至楊達去世之後才公開發表。⁴慶幸的是近年來台灣研究蔚為顯學，過去被認為佚失的文獻資料相繼挖掘出土，對於考察楊達在戰後初期的活動狀況有莫大的助益。本文主旨即在藉由第一手史料與楊達親友的回憶撥開迷霧，深入以往研究的禁區，勾勒楊達在戰後初期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參與之概況，填補以往楊達研究的疏漏之處。

二、參與建設台灣的戰後新生活

1982年，日本學者若林正丈訪問楊達時，曾經提起他聽到一位任職於日本陸軍特務系統，在海南島從事訓練工作者的真實經歷：戰爭一結束，位居下屬的台灣青年立即滿口的三民主義，並且十分了解其內容，令人訝異。⁵其實當年台灣人對於三民主義的熟悉，正深刻地反映出台灣民眾在戰局中對時事的關注，和滿腔對於國民政府的熱烈期待。日本宣布投降後，雖然未來的不確定性使部分台籍知識分子在迎接和平的雀躍之外，還雜揉著些許不安的複雜情緒，⁶不過很快地，茫然被積極歡迎國民政府的歡欣鼓舞所取代，地方菁英結合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作家主動或被動加入者不乏其人，葉榮鐘、張星建、巫永福、吳新榮、呂赫若即是著名的例子。為了與中國文化順利接軌，各地紛紛成立學習北京話的國語講習所，《三民主義》的研讀瞬間蔚為風潮。

為迎接三民主義新時代的來臨，台灣人一窩蜂地湧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積極參與，或探問情勢。楊達曾經在回憶中說自己當時雖然也經常在台中的三青團露面，但根本無意參加；而是「想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建立自己的組織，採

外，楊達接受陳春美訪問時說過，他在1982年訪美期間精神愉快，回到台灣卻常常不知如何下筆，這些都證明楊達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格外謹慎的態度。見〈二二八事件前後〉與〈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達〉，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頁98、頁267。

4 楊達去世於1985年3月12日，兩篇口述記錄均發表於1985年5月。

5 〈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達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楊達全集》「資料卷」，頁282。

6 吳新榮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記上說：「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又說：「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這真是台灣知識分子面對終戰時心境最真實的告白。見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戰後）》（台北：遠景，1981），頁3。

取自己的方針」。⁷關於此事楊逵所言不假，事實上早在距離戰爭結束不過僅八天的8月23日，楊逵就和李喬松帶著「解放委員會」的宣傳單連袂往訪林獻堂，林獻堂勸導兩人勿輕舉妄動，並說道：「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惟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擾亂社會秩序也。」⁸然而楊逵並未接受林獻堂的建議，根據池田敏雄日記的記載，9月4日楊逵仍著手組織解放委員會。⁹

因缺乏史料，目前有關解放委員會之詳情尚無法得知。1982年楊逵訪美回程過境日本，接受戴國輝與內村剛介訪問時，對該委員會之始末有過簡略的敘述，他說：

台灣總督府向國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10月25日，在這一天以前，我組織了解放委員會，意思是要總督府的統治權停止，我們的要求，特高課長（譯註：指的是台中州廳警察內的特別高等刑事課課長）是以默認的方式接受了，當他向上面呈報時，上面卻回說不行，因此才想從文化方面做點事，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出版了「阿Q正傳」。¹⁰

可見楊逵原有意藉由解放委員會參與政治活動，受挫之後乃轉而從事文化事業，並以魯迅文學之傳播為主要工作內容。¹¹再者，從未及發展就宣告結束的

- 7 見〈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楊逵全集》「資料卷」，頁282。
- 8 楊逵與李喬松攜帶「解放委員會」宣傳單往訪林獻堂一事，見於《灌園先生日記》1945年8月23日之記載（尚未刊行），並首度被揭露於許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獻堂〉（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頁1004）。筆者曾就此事請教參與《灌園先生日記》註解的友人何義麟，何義麟在給筆者的電子郵件（2004.09.08）中指出許文將「解放委員會」稱為「解放聯盟」的錯誤，並錄下日記所載林獻堂對楊、李兩人的這段說辭提供參考。何義麟還認為：「這樣的想法反應出，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地方仕紳與楊逵等左翼人士，雙方對戰後台灣的前途看法有明顯的落差。」
- 9 池田敏雄在9月4日的日記裡說：「楊逵（作家）取得台中州當局的諒解，正在組織『台灣解放委員會』」。見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台灣文藝》85期，1983.11，頁180。
- 10 引自陳中原翻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1982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紀錄〉，《文季》1卷4期，頁28。《楊逵全集》「資料卷」雖然收有這篇訪問稿，然因採用的葉石濤譯文僅節錄前半，故此處引文並未收入其中。附帶一提的是在接受戴國輝與內村剛介訪問的兩日前，戴國輝與若林正文共同訪問了楊逵，當時戴國輝曾就此事詢問過楊逵，楊逵的回答則是：「沒有『解放委員會』那樣的名稱，我確實在著手組織團體，日本警察也對此默認」。（〈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楊逵全集》「資料卷」，頁281）由於「解放」兩個字的敏感性，筆者推測楊逵的反覆其詞，應該是顧慮到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權對左翼人士的迫害所致。
- 11 除了引文中提到的《阿Q正傳》（「中國文藝叢書」1輯，中日文對照，台北：東華書

解放委員會，恰可窺見楊遠等左翼人士反應之迅速，迫不及待要有一番積極性的作為，此與林獻堂靜觀時勢之變的態度大相逕庭。

從戰爭結束到10月份中國軍隊接收台灣，25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行政長官陳儀代表接受日軍受降為止的兩個多月間，台灣島呈現無人領導的政治空窗期。根據吳濁流自傳體小說《無花果》的記錄，由於青年自動自發組織起來維持無政府狀態時的秩序，台灣地區反而締造了治安史上的黃金期。¹²8月31日，面對政治真空帶來的社會亂象，在台中的楊遠也集合關心社會的青年男女，組成團隊清掃街道，並負責維持台中市街的秩序。由於在中國的蔣介石委員長曾經號召「新生活運動」，當時的台灣民眾對其仰慕萬分，楊遠領導組織的這支隊伍乃取名為「新生活促進隊」。楊遠之妻葉陶擔任宣傳，被其演說帶動的民眾紛紛加入，隊伍的聲勢越來越浩大。促進隊行動之前，楊遠擬定兩項原則：

- (1) 「新生活促進隊」要清掃的，不只是路上垃圾，而是想更進一步掃除台人的奴隸劣根性，要台灣人醒覺，不要因為沒有統治者日本人的壓制，而無法自覺無法自理，以至公德敗壞，社會日益混亂。
- (2) 「新生活促進隊」的隊員，絕不可收受分文報酬，才不致使這個有意義的「新生活促進隊」淪為一般「清潔隊」。¹³

從自備清掃工具且不收任何報酬看來，楊遠組織新生活促進隊兼有改造社會的神聖使命。可惜少數成員居心不良，私下向民眾索取清潔費用，導致其他成員不滿，造成內部的摩擦。在這些不肖之徒還錢之後，才終於平息了眾怒。¹⁴

因為領導新生活促進隊，楊遠在百姓之間頗有聲望。活動結束之後，以廖金和（外號「阿狗」）為首的一些黑道分子主動找上楊遠，表示願意在政府尚

局)由楊遠翻譯，於1947年1月出版之外。在此之前，《台灣評論》1卷2期，1946.08.01，封底有楊遠譯，《魯迅小說選》的廣告，標明「中日文對照·革命文學選」及「近日刊行」（該書未見，疑未曾出版），顯見楊遠當時熱衷於魯迅文學之介紹。有關楊遠在戰後初期傳播魯迅文學之詳情及目的，請參考拙文，〈楊遠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台灣文學評論》4卷4期，2004.10，頁101-122。

12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1988），頁160-161。

13 引自鍾天啟（鍾逸人），〈瓦窰察裡的楊遠〉，《自立晚報》，1985.03.29。鍾逸人在《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1988）中也有同樣的記載，僅有幾個字的差異，見該書，頁285。

14 〈瓦窰察裡的楊遠〉，《自立晚報》，1985.03.29；《辛酸六十年》，頁284-287；鍾逸人，〈我所認識的楊遠〉，收於路寒袖主編，《台灣文學研討會：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518-519。

未接管之前，組織台中市內所有道上兄弟，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楊逵將他們組織為「民生會」，並接管已沒有警察的錦町派出所（今中正路、和平路口）作為本部。眾人約定以地主和商人的捐獻解決生活問題，任何人不得私自接受市民捐獻或索取酬勞。自他們整頓攤販，在街道巡邏站崗之後，市街恢復原有的秩序。與新生活促進隊一樣美中不足的是部分會員公報私仇，或以該會作為掩護，暗中進行不法勾當。¹⁵

1945年8月底，前台灣農民組成員張士德（原名張克敏）¹⁶由中國返台，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獲得熱烈迴響，各縣市分團籌備處陸續成立，至1946年3月為止，所屬團員已達三萬人之多。¹⁷194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成立。由於三青團搶先一步吸收了進步份子和熱血青年，加入國民黨者多是保守份子和有力紳士，形成三民主義之下有兩大派別的畸形現象。¹⁸根據陳逸松的說法，他在被任命為三青團台灣區團部主任之後，隨即運用人脈成立各地分團，台中負責人為張信義與楊逵。¹⁹但當時曾加入台中分團，後赴嘉義分團擔任幹部的鍾逸人則以親身見聞指出：楊逵夫婦不但未曾加入三青團，其後還參與籌組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在前文協、農組與台共等左翼人士多選擇參加三青團時，楊逵為何做出極為不一樣的決定，反而加入與三青團呈現對立態勢的中國國民黨？鍾逸人認為此係緣於和農組同志張信義之間的「瑜亮情結」，並有以下的闡述：

1945年大戰結束後的九月，張士德由上海回台灣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等楊逵摸清張士德即為前「農組」本部工友張克敏時，張士德已經委託他的小同鄉張信義，擔任中部地區推廣團務的負責人。

當楊逵獲悉此消息後，儘管張士德與張信義想盡辦法禮聘楊逵，希望他能參加「三青團」，共為建設台灣打拼，楊逵還是表示他沒興趣，始終拒不接受。然而不久後，楊逵和葉陶，卻找我幫忙接收一棟日本人的

15 〈瓦寮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03.29；《辛酸六十年》，頁287-290；〈我所認識的楊逵〉，《台灣文學研討會：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頁517。

16 張克敏，台中大甲人，原台灣農民組成員，早年赴中國，進黃埔，入軍統，戰後以台灣義勇隊副隊長名義返台。參見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台北：前衛，1994），頁301。

17 王世慶，〈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二二八事件（初探）〉，《史聯雜誌》21期，1992.12，頁6-8。

18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台北：前衛，1991），頁191。

19 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台北：前衛，1994），頁301。

「信用組合」建築（現在的台中「三信」總社），以做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籌備處。

至此我才知道，楊遠盼任「三青團」中區負責人不成，心中已非常不快，還要他在「大個子信義」麾下做事，更使他無法忍受。於是他便自動加入朱炎（東勢人「半山」）正在台中招兵買馬，卻乏人問津的中國國民黨台中籌備處，擔任執委，葉陶則任台中市黨部婦運會副主委。²⁰

除了和張信義個人的意氣之爭外，筆者推測由於1928年間楊遠和農組同志曾經有過派系鬥爭，當年主導將楊遠逐出農組的幹部派成員簡吉、陳崑崙時任三青團重要幹部，與楊遠、葉陶夫婦向來不合的謝雪紅掌管三青團婦女隊，²¹楊遠拒絕參加三青團很可能與這些歷史宿怨不無關係。

1946年春，莊遂性擔任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有意以之為基地推展民眾教育運動，協助政府建設新台灣，乃聘請葉榮鐘任編譯組長，兩人合作聘請台灣大學留用的日籍教授講學，創設婦女講座，並將閱覽室開放，由會員輪流作東準備茶點，集合台中市內知識份子，每日下午4點起舉行談話會，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為止。會中一半的時間請台中師範北平籍的老師朗讀國語課本或新聞社論，另一半的時間自由談話，內容包羅萬象，無所不談。由於關心台灣將來的建設，政治經濟仍是中心話題。從1947年的談話室茶會每月定日值東表來看，台中文化界知名人士幾乎都參與其中，除了主辦的莊遂性與葉榮鐘外，尚包括霧峰的林獻堂及其家族，以及張煥珪、張深切、張星建、吳天賞、何集璧、周定山、許乃邦、藍更與、廖繼春、莊垂勝、謝雪紅……等人。楊遠也參與其事，每月二日固定與高兩貴、王金海、徐成三人輪值作東。²²

根據鍾逸人的說法，其間目睹中國軍隊登台之後一連串違法犯紀的行為，民眾對於新政府的熱情逐漸澆息，楊遠總以為和祖國隔閡太久，台灣人民對其

20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台北：前衛，1995），頁400。2003年4月7日，楊建先生（楊遠次子）接受筆者訪談時，也說楊遠夫婦戰後初期曾一同加入中國國民黨，據此推斷鍾逸人上述說法應當可信。參見〈楊建先生訪談記錄〉，附錄於拙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遠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07），頁399。

21 簡吉時任三青團高雄分團部幹事與書記，陳崑崙擔任屏東分團部書記，謝雪紅為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台灣省婦女隊隊長。三青團幹部名單見王世慶，〈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二二八事件（初探）〉，《史聯雜誌》21期，頁7-10；陳翠蓮，〈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戰後台灣〉，《法政學報》6期，1996.07，頁76-78。

22 參考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426，及頁433-434之〈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省立台中圖書館談話室茶會每月定日值東表〉。

政治文化未能深入了解，不相信三民主義的祖國會如此令人失望，於是打算以農場的兩座廢窰籌辦政治學校。這個計畫的構想是：利用金關與中井兩位教授相贈有關新中國藍圖與三民主義學術論著為教材，招訓鄉村青年，施以60天的勞動兼政治訓練，課程修畢暫時遣返鄉下，以教育當地民眾。等第二批、第三批分別修業回鄉，再招第一批學員授以進級課程。直到接受過三次，共180天的訓練之後，便正式結業，可以成為各鄉鎮的基層幹部。至於經費來源，一方面來自於社會捐獻；一方面由學員包辦全台中市的水肥，向市政府請求清潔費，再把水肥賣給大戶農民。學員既體會勞動神聖的意義，也籌措了政治學校的經費，可謂一舉兩得。如果計畫順利推行，結業的鄉村青年都是建設理想社會的「種子」，藉此可往建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逐步邁進。然而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該計畫終究未曾付諸實行。²³

除此之外，1945年9月間楊逵創辦一陽週報社，發行《一陽週報》等介紹孫文思想與中國政情的書刊，以實際行動回應了研讀三民主義的熱潮。²⁴大約在1946年間又創立民眾出版社，²⁵預計出版「小說故事篇」有賴和《善訟的人的故事》、周定山《愍光義·王仔英》、林荊南《鴨母王》與胡風翻譯的楊逵《送報伙》四冊，「歌謠俚言篇」有《謝賴登歌集》、《陳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三冊，以及「常識論說篇」有《憲政問答》、《民主問答》、《自治問答》三冊。²⁶從出版書名之篇目與內容來看，文學部分多為台灣民間的故事歌謠，常識論說篇則以民主素養的培育為主，楊逵在推廣民眾教育上的努力由此可見一斑。然上列書籍目前僅見《善訟的人的故事》（1947年1月出版）一本，其餘可能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楊逵被捕而未能發行。²⁷

23 關於楊逵的這個計畫是否真正推行過，鍾逸人在1985年發表的〈瓦窯寮裏的楊逵〉明白表示因二二八事件發生而未曾施行；但15年後演說的〈我所認識的楊逵〉中則是說已經付諸實現。恐怕因事隔多年，鍾逸人的記憶有誤。詳見〈瓦窯寮裏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03.29；〈我所認識的楊逵〉，《台灣文學研討會：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頁521-522。

24 詳見拙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07），頁230-235。

25 《善訟的人的故事》（1947.01）版權頁註明發行人為葉陶（楊逵之妻），負責出版業務之民眾出版社地址「台中市大同路新北里存義巷十二號」為楊逵住處，因此可知民眾出版社為楊逵所創立。

26 民眾出版社發行計畫所列篇名與書名，得自於楊逵主編《善訟的人的故事》封底廣告。

27 根據林曙光的話，楊逵為善編歌謠的好友謝賴登結集成《謝賴登民謠集》（按：正確書名應為《謝賴登歌集》），出書廣告上報後，因二二八事件爆發楊逵被捕而無下文。參見林曙光，〈趕上日本「大正德模克拉西」尾班車的文藝評論家——劉捷〉，附錄於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九歌，1998），頁208。

三、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及遺族的救援

1945年11月17日，在台灣各種民間組織重組之際，陳儀頒布〈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勒令當時已組成的所有團體全數解散，重新登記。官方對於蓬勃政治活動大力壓制，使得台灣人民以為戰爭結束即獲得解放，從此可以自由參政的美夢橫生阻礙。其中「台灣農民協會」的組成以昔日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為中心，並包括文化協會與台灣共產黨員在內。成立不久，原農組成員侯朝宗改名劉啟光，²⁸以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少將團長頭銜衣錦還鄉，隨即積極介入台灣農民協會的活動。二二八事件後逃亡大陸的蘇新對此事評論說：

恰好此時，日治時代曾參加過台灣農民運動的侯朝宗由國內回來。他在國內改名為劉啟光，轉向為國民黨的黨徒，甚至成為「軍統」的台灣首魁。他帶了一批特務人員返台工作。他看見「台灣農民協會」帶有左傾的色彩，可能成為中共的活動地盤，就利誘一部分幹部出來做官，陰謀瓦解這個組織；一方面他又威嚇農民說「農民協會」是共產黨的組織，一定會受到政府的干涉，不如趁早改為「農會」，以避免將來必然到來的不幸云云，以破壞農民的團體。

這樣，農民協會竟被一部分不堅定的機會主義者所欺騙和出賣，以致無形中陷於停頓，後來也被當局解散了。這些事件後來竟造成了台灣農民運動的許多障礙，「二二八」民變時，不能動員農民起來參加，這也是其原因之一。²⁹

共產黨員的蘇新與國民黨員的劉啟光分屬敵對的陣營，因此所謂劉啟光站在國民黨立場陰謀瓦解農民運動的說法並不見得可信。就目前已知的史料來看，〈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頒布後，農民協會即主動將本部

28 劉啟光（1905-1991）原名侯朝宗，生於嘉義縣六腳鄉，1923年台南師範學校結業。1926年被解除在蒜頭公學校的教職後，專心投入農民運動。1930年潛往廈門，1945年協助中國接收台灣的工作，衣錦返鄉。1946年，劉啟光負責籌備將日治時期的華南銀行與台灣信託公司合併改組為華南商業銀行，次年被選為董事長。參見韓嘉玲編著，《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1997），頁107-113。

29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116-117。

更名為「台灣省總農會籌備處」，各地分會則正名為該地農會籌備處，³⁰然而次年1月18日仍被民政處以不合法規之由宣布不准辦理。³¹另一方面，官派組織台灣省農業會辦理日治時期農業會組織接收事務完畢之後，於1946年4月20日召開改稱台灣省農會的全省代表大會，³²取得農民團體的合法地位。可見農民協會之潰散實肇因於陳儀的統治政策，因而徹底喪失農民代表權與活動的空間，尚無證據足以顯示劉啟光從中設計破壞；反而是劉啟光先後參與組成的「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與「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促成昔日農組成員在陳儀政府的壓制之下依然活躍一時。

1945年10月30日，原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民眾黨、工友會等幹部20餘人群集劉啟光寓所舉行座談會，討論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紀念及遺族撫恤等事宜。會中決議組織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由連溫卿擔任總會會長，鄭明祿為秘書，劉啟光、王萬得、張邦傑、李萬居、張士德、張晴川、廖進平及各區主任為總會常任調查員，並推舉蔣渭川、李傳興、張信義、李曉芳、簡吉、張天送分別擔任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含澎湖）、台東（含花蓮港）各區分會主任，各區主任再函聘常任調查員五名及非常任調查員若干人，調查50年來因反抗日本統治而犧牲的先烈事蹟及遺族情況。預計六個月的時間調查完成後，編印紀念冊，發動全島追悼會。該會並請求政府促成在台灣神宮舊社建築先烈祠，行春秋兩祭，設立先烈遺族教育基金以獎助遺孤升學，與撫恤先烈遺族等。³³

根據報載，討論組成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的同一天，上述各日治時期革命團體成員亦召開創設「台灣民眾聯盟」的磋商會，席上選出七名起草委員，緊接著於11月4日的起草委員會中議決籌備事宜，並擬定籌備委員45人的名單。³⁴其中張邦傑、張信義、李曉芳、劉啟光、鄭明祿、簡吉、廖進平、張晴川、王萬得、潘欽信、連溫卿、蔣渭川等12人，亦同時出現在前述報導參

30 〈農民籌組台灣農會〉，《台灣新生報》，1945.11.18。

31 〈整訓本省人民團體 民政處報告目前之情形〉，《台灣新生報》，1946.01.19；何義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02）論文，收於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頁171。

32 廖學義，〈台灣農業會之發展與現狀〉，《民報》，1946.04.20-21；〈農業會を農會に改稱 きのふ代表大會開幕典禮〉，《台灣新生報》，1946.04.21。

33 〈光復聲中追念先賢 先烈事蹟調查加緊進行〉，《台灣新生報》，1945.10.31。

34 〈各團體大同團結 將組織台灣民眾聯盟 本三民主義宗旨〉，《民報》，1945.11.07。

與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的人員當中，由此可見兩團體關係之密切。然而民眾聯盟籌備委員名單刊出翌日，劉啟光旋即刊登概不參加任何政團或社團的啟事，³⁵表明無意參加。1946年1月6日，民眾聯盟改組為「台灣民眾協會」正式成立。³⁶4月7日，再度更名為「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³⁷何義麟比對改組前後幹部名單研究指出：民眾協會因批判執政當局，遂與陳儀政府形成對立的態勢，並因而遭致當局的刻意干擾，曩昔抗日各團體終於走向分裂，原先參與籌組民眾協會的新文協與農民組成員，大多未能擔任政治建設協會的理監事職。³⁸

1946年1月25日，曾表態不參加民眾聯盟的劉啟光被派任新竹縣長，³⁹爾後他不僅延攬連溫卿、簡吉等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左翼人士進入縣府工作，並召集前農組與新文協成員策劃組織「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於同年4月21日正式成立。⁴⁰民政處根據該會主任委員劉啟光檢附的組織大綱、工作計畫書及委員名冊，5月間准予備案。⁴¹從呈請備案時所附會章與事業計畫書來看，其宗旨為救助在日本統治下為解放台灣而犧牲之革命先烈遺族，與受刑殘廢或年老失恃的志士；工作內容主要有獎助先烈子弟升學、指導先烈遺族或革命志士就職就業、協助建立生活基礎、救濟非常災害、補助必須之生活等項，無疑是接續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的任務而來。

另從呈請備案的委員名冊來看，參與組成的人員依其職務共分成主任委員、常務委員、委員、顧問等四種。除主任委員由劉啟光一人擔任外，常務委員有簡吉、楊貴（楊達本名）、張行、鄭明祿、王萬得、李傳興等六人；委員有李喬松、周井田、趙欽福、陳鵠、謝賴登、周坤棋、李天生、鄭有文、陳啟瑞、陳崑崙、林阿鐘、林建才、黃石順、周天啟、張道福、溫勝萬、謝武烈、陳標中、洪石桂、莊孟候、廖進平、李振芳、謝娥、楊元丁、顏石吉、賴通

35 〈劉啟光啟事〉，《民報》，1945.11.08。

36 〈台灣民眾協會 第一次改組典禮 討論島內重要問題 對蔣主席等致謝電〉，《民報》，1946.01.08。

37 〈熱血熱情而發足 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成立〉，《民報》，1946.04.08。

38 詳見何義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72-176。

39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新竹縣志》（一），出版者不詳，1976，頁100。

40 〈台灣革命先烈遺族 救援委員會設立 新竹下發起人會開催〉，《台灣新生報》，1946.04.21。

41 詳見國史館檔案450-162〈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民政處。本研究所用國史館檔案影本皆為友人何義麟所提供，相關研究亦得力於其先行研究甚多，謹此致謝！

堯、林碧梧、謝雲（疑為「雪」之誤）紅、盧炳欽、劉溪南、林糊、李曉芳、周渭然、張信義、張庚申、楊春榮、林永棟、林萬振等 38 人；顧問有丘念台、林獻堂、李翼中、周一鶚、李友邦、王甘棠、李萬居、王添灯、林忠、林茂生、宋斐如、盧冠群、陳旺成、邱德全、楊金虎、黃朝琴、陳純仁、林瑞西、石錫勳、許嘉種、陳逢源、韓石泉、蔡培火、李明家、黃呈聰、羅萬俤、陳敏生、楊老居、施江西、廖西東、洪水治、柯水發、蔣渭川、連震東、郭雪湖、陳澄波、黃啟瑞、楊倉庫、楊佐三、張兆煥、李友三、林日高、杜聰明、游彌堅、連謀、黃克立、韓聯和、石延漢、郭紹宗、陳東生、王一、龔履端、陸桂祥、謝東閔、劉存忠、袁國欽、謝真、張文成、傅緯武等 59 人。

根據報載，成立後的第一次委員會中選出簡吉為總幹事，楊逵為副總幹事，張行、林建財、李傳興分別擔任救援組、總務組、調查組主任幹事，另外選出協助委員 92 名。⁴²該會眾多成員雖然涵括外省與本省籍，但從名冊的排序即可窺知係由過去活躍在左翼運動，尤其是原台灣農民組合的成員主導整個行動。從官報的《台灣新生報》於其成立後密集報導相關活動，甚至在 6 月 17 日忠烈祠奉安典禮當天大篇幅報導典禮進行細節來看，將任職國民黨黨部的丘念台與李翼中、三青團台灣區團部的李友邦，以及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周一鶚與各縣市長等黨政要員列為顧問，極有可能就是為了成功爭取官方支持策略運用。

根據該會公佈的標準，所謂「台灣革命先烈」即曾為解放台灣從事反日運動而業績卓著或壯烈犧牲者。⁴³5 月 18 日，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召開時，決議將桃園神社改建為忠烈祠，定 6 月 17 日台灣淪陷紀念日舉行奉安大典，奉祀諸先烈入祠，以鄭成功為奉祀主神，並印就捐款名冊，為救濟先烈遺族籌募基金。⁴⁴此外，該會幹部亦分赴各地調查先烈及遺族近況，並保送趙港遺孤趙炳煌就讀省立桃園農林學校。⁴⁵6 月 17 日，劉啟光率新竹縣各局科人員與各機關學校團體代表，會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林炳康、丘念台，以及遺族代表共五千多人舉行奉安典禮，丘念台另以遺族身分代表答詞。禮成後並有藝閣、獅

42 〈先烈的遺族救濟へ 五月一日から義獻金募集〉，《台灣新生報》，1946.04.26。

43 〈新竹縣忠烈祠本年度 入祀先烈芳名〉，《民報》，1946.06.01。

44 〈崇祀先烈撫恤遺孤 桃園神社改建忠烈祠〉，《台灣新生報》，1946.05.27；〈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 崇祀先烈撫恤遺孤 桃園神社改建忠烈祠〉，《民報》，1946.05.28。

45 〈新竹縣忠烈祠本年度入祀先烈芳名〉，《民報》，1946.06.01。

陣等大遊行，場面盛大且莊嚴隆重。⁴⁶

當天入祀桃園忠烈祠先烈除鄭成功外，抗日烈士共計 72 名。根據新竹縣政府官方的介紹，其姓名及參與之革命團體或事蹟如下：台灣民主國的丘逢甲、劉永福，北埔事件首領蔡清琳，林杞埔事件首領劉乾，密謀驅逐日人被處以死刑的黃朝，東勢角事件首領賴來，大甲事件首領張火爐，苗栗事件的羅福星、江亮能、黃光樞、傅清鳳、謝德香、黃員敬，大甲支廳館內派出所襲擊事件首領羅嗅頭，西來庵事件首領羅俊、余清芳、江定，台灣黑色聯盟幹部周和成，霧社大革命事件的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文化協會及民眾黨領導人物蔣渭水，台灣勞働互助社幹部蔡秋宗，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勞働互助會幹部潘盧，農民組合幹部劉千、董抱（蒼）、陳結、林龍、陳神助、吳久、邱天送、趙港、陳德興、劉双鼎、劉慶雲、徐阿番、吳盛連、劉喜順、劉俊木、莊垂郎、林銳、黃信國，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幹部黃春生、李明德、郭常，文化協會及反帝同盟幹部張茂良、吳拱照，工會幹部王細松，船員工會及反帝同盟幹部劉纘周，廈門台灣青年反帝同盟幹部康續（至誠），廈門台灣青年反帝同盟及上海台灣青年團幹部高水生、董文霖，上海台灣青年團幹部陳麗水、翁澤生、陳炳譽、蔣文來，眾友會組織者曾宗，曾參加西來庵事件的眾友會幹部呂清池，眾友會幹部蔡双加、楊馬，農民組合幹部因大湖事件被捕的黃雲漢、陳盛麟、陳天麟，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籌備處組織科長陳哲生，文化協會幹部賴和、王敏川，黑色青年聯盟幹部洪朝生，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主任委員翁俊明，文化協會協理及民報發行人林幼春，台北工友協助會領袖薛玉虎，台北工友協助會文化協會幹部盧清潭，瞧吧哞事件的蘇有志、謝成。⁴⁷

新竹縣奉安典禮籌備期間，官方與民間其他團體亦積極展開台灣革命先烈的紀念行動，例如省民政處將原日人之護國神社改建為省忠烈祠，並於 1946 年 5 月中旬修理完竣。⁴⁸ 5 月 25 日，台灣民主國 51 週年紀念，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由宣傳處長林紫貴與委員丘念台聯名，邀請各界於省黨部大禮堂舉行座談會。根據《新生報》的報導，台灣省黨部紀念台灣民主國之緣由乃因：

46 〈民族精神昭彰史冊 新竹忠烈祠昨奉安典禮〉及〈藝閣獅陣が總進軍 桃園終日空前の大賑ひ〉，《台灣新生報》，1946.06.18。

47 見〈新竹縣忠烈祠入祀先烈及其遺族姓名〉，桃園林照像館攝影，《新竹縣忠烈祠奉安典禮紀念留影》（新竹：出版者不詳，1946）。筆者研究用影本係由林柏燕先生提供，原件所有人為入祀先烈吳拱照遺孀葉焯妹女士，謹此致謝！

48 〈紀念本省革命先烈 護國神社改建忠烈祠〉，《台灣新生報》，1946.05.21。

鑒於此係台灣重要之民族革命運動，同胞之祖國愛與向心力，在當時曾有具體表現。值茲台灣光復之後，對此光榮歷史實應予以擴大宣傳，灌輸三民主義，俾同胞深切認識黨國，從以加強此祖國之愛與向心力，以共策建國大業。⁴⁹

以「祖國愛與向心力」詮釋台灣民主國，清楚可見國民黨藉由台灣抗日運動史的強調，意圖將台灣人統攝在和中國人共同的中華民族主義之下。

另外，奉安典禮進行的同一日，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主辦，國民黨省黨部贊助之台灣革命先烈追悼及紀念大演講會，假台北延平路第一劇場舉行。蔣渭川擔任主席，與會者有川康國大代表呂超等三人，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市府代表黃啟瑞、警備總部代表張裕華及王添灯暨各界共約一千餘人。會中演講者及其講題有林紫貴的「三民主義與台灣革命」、呂伯雄「革命精神」、黃朝生「追憶蔣渭水先生」、張晴川「台灣革命先烈之血淚」、蔣渭川「台灣革命三百年史」。⁵⁰在「爭奪抗日權威正統性」上，⁵¹遺族救援委員會的聲勢顯然較此略勝一籌。

遺族救援會為統一祭祀辦法，提高人民對先烈的崇敬之心，曾經呈請民政處明令規定台灣各地忠烈祠每年舉行春秋兩祭，而以4月17日馬關條約紀念日與10月25日本省受降紀念日為祭日，由當地最高行政首長主祭，並規定各地忠烈祠以鄭成功為主祀，合祀本省因從事反日革命運動而壯烈犧牲之先烈或畢生奮鬥始終不屈之先賢。台灣抗日菁英在政權更迭之際，經由紀念先烈與遺族救援的行動，迫不及待為昔日反抗殖民政府的同志進行平反，藉此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象徵意義極為重大。不過民政處呈請在南京的內政部裁示之後，仍維持中央政府所定之3月29日與9月3日為祭日。⁵²戰後初期台灣本地自動自發積極展開的去殖民化行動，不久即被中央政府全盤中國化的政策所扼殺。⁵³

49 〈省黨部宣傳處召開座談會 紀念台灣民族運動〉，《台灣新生報》，1946.05.24。

50 〈革命先烈追悼會 諸士紳登場紀念演講〉，《台灣新生報》，1946.06.18。

51 何義麟認為遺族救援委員會工作目標雖與政治建設協會紀念先烈之活動有所差異，但無疑地，遺族救援委員會活動也具有「爭奪抗日權威正統性」之意味。見〈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88。

52 〈提高人民崇敬之心 忠烈祠應春秋二祭 反日運動犧牲先烈當合祀〉，《台灣新生報》，1946.06.11；國史館檔案051-013〈革命志士功績案〉。

53 台灣抗日菁英紀念台灣革命先烈日期與國府所定紀念日不同，其意義正如何義麟所言：「台灣抗日菁英透過紀念先烈建構自主性去殖民化的行動，自始即遭國府的漠視與壓制。」見〈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88。

四、楊逵與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等團體

根據鍾逸人的回憶，返台後的劉啟光曾經親自登門拜訪楊逵，想說服楊逵擔任新竹縣的社會科長或民政局長。⁵⁴雖然婉拒出任公職，楊逵參加了以劉啟光為中心的兩個左翼社團——台灣評論社與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⁵⁵前者是台灣旅居京滬人士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型態所組成，1946年1月8日於上海成立的股東大會上選出劉啟光為董事長，丘念台為董事兼社長。同年7月1日該社在台北創刊《台灣評論》月刊，主編為李純青，台灣廣播電台台長林忠擔任發行人。該雜誌為大陸左翼文人與台灣左翼勢力合作的產物，由於出現親共產黨與批判國府統治等言論，1946年10月發行第四期後即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下令停刊。⁵⁶楊逵針砭陳儀政府的〈傾聽人民的聲音〉（〈人民の聲を聽け〉）即在該雜誌刊出。⁵⁷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楊逵在劉啟光領導的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中列名常務委員，報載他並曾以該會副總幹事的身分出發各地慰問先烈遺族。⁵⁸奇怪的是楊逵生前從不曾提起和該會相關之事蹟，幸而《楊逵全集》編輯期間由於新聞界的報導與協助，有王之相先生主動聯絡編輯委員之一的陳芳明教授，請其代為轉交給楊逵全集編譯委員會楊逵遺物一批，其中有一疊「調查表」與標明「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名冊，⁵⁹對於了解該會之運作和楊逵參與的情形頗具貢獻。

上述楊逵遺物中發現的「調查表」共39頁，右下方均有印刷字樣標明「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表格內含先烈姓名、性別、籍貫、出生年月日、死亡年月日、出身經歷、革命事蹟、犧牲地點經過狀況、調查參考資料、遺族姓

54 鍾逸人，〈瓦窯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03.29。

55 根據《楊逵畫像》的說法，楊逵於1946年加入台灣評論社；不過楊逵參加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一事該書並未記載。參見《楊逵畫像》，頁145。

56 何義麟，〈《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台灣史料研究》10期，1997.12，頁29-31。

57 原載於《台灣評論》1卷2期，1946.08，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詩文卷」（下）（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頁226-227。

58 〈新竹縣忠烈祠本年度入祀先烈芳名〉，《民報》，1946.06.01。

59 王之相先生送回的物品包括楊逵及其文友的手稿，以及部分從未出土的史料。據陳芳明教授轉述王先生本人的說法，這些物品係1982年散步至東海花園外所拾獲。不過楊翠（楊逵孫女）在《楊逵全集》編輯會議召開時私下向筆者表示：王先生檢到的時間應在1981年，當時楊逵移居大甲次子楊建家，東海花園有一批楊逵物品失竊。如此看來，王先生送回的應該是竊賊遺落於東海花園外的，很可能還有部分楊逵遺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

名與生活狀況、調查人住所姓名，以及再查人姓名等，並已用手寫方式填入資料，推測是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殘存的調查報告。目前尚無證據顯示楊逵曾經加入該會，這份資料應該是提供遺族救援委員會工作參考之用。其中曾被調查的抗日份子有鄭芳春、陳阿仿及其部下、謝德茂、簡大肚及其部下、黃阿丑、簡義及其部下、劉永福、張臨、柯鐵及其部下、賴成、蔡輕云、簡其才、陳朝宗以下大鞍事件被囚禁同志、賴文興等人，其中多位或因仍存於世，或因有其他考量，並未在入祀忠烈祠的名單之中。其實奉安典禮當天入祀的72名抗日烈士，除了參與武裝革命者之外，「其他大多為農民組合與左傾後文化協會之成員，台灣民眾黨幹部僅蔣渭水列名；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掛名其他政治團體，但實為共產黨員的抗日烈士，例如翁澤生等」。⁶⁰因此雖然劉啟光在台灣廣播電台報告該會使命時特別聲稱：只要是參加反日運動受了犧牲或現尚生存的志士，該會將一視同仁予以援助救濟，對於革命同志以往的派別絕無歧視，⁶¹實際上提報入祀紀念者仍以左翼抗日陣營為主。

「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委員名冊」亦為手寫填入的表格，共23頁。從名冊的最後一頁填滿看來，很可能是份殘稿。其中有成員在該會的職務、籍貫、通訊處等介紹，格式與呈請民政處備案的文件近似，推測應為「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原始名冊。該資料與備案名冊不同之處在於林獻堂及各縣市長原列為「委員」，後於民政處備案時改列為間差性質的「顧問」，由此隱約可見抗日勢力派別介入工作安排的考量。另外，職務方面還有協助委員的基本資料，從名冊上地址相同的人名扣除重複者，現存資料共計143名，較《新生報》報導增設協助委員時選出的92人數目為多，據此可窺見當初列為被選舉人與報載缺乏被選出實際參與者之名單。依其順序有張健民、林岸、葉陶、林港、陳竹興、黃永鳳、黃綿官、吳仁和、柳德裕、江天來、詹木枝、陳文俊、馮清波、蔡溪惟、李得義、洪麟兒、林章梅、林隆猷、莊心、張金鎗、郭耀南、溫祿煌、張戊申、陳貫世、陳金城、姜林小、陳、曾龍尾、陳清涼、馮進財、馮慶、詹振泰（恭？）、⁶²劉茂成、高石海、蔡德

60 引自何義麟，〈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之建構——試析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7期，2000.01，頁6。筆者引用已獲作者同意，謹此致謝！

61 劉啟光，〈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使命——五月三日在台灣廣播電台廣播詞——〉，《台灣新生報》，1946.05.09。

62 由於手稿上有幾個人名重複的地方，「詹振泰」、「詹振恭」兩個名字恰巧也在重複之處，因此研判為同一人。但究竟正確寫法為「泰」或「恭」，目前無法判定。

音、林月珠、呂寶、陳惟童、陳荊山、趙淇秀、邱芹右、施石青、簡娥、張玉蘭、侯春花、蘇清江、翁來成、孫右平、郭秀宗、林清海、陳總、曾得志、蕭來福、潘欽信、顏永賢、廖瑞發、蘇新、徐春鄉、黃天鑑、顏錦華、姚敏宣、許乃昌、陳煥圭、王白淵、黃朝生、林水旺、林樑材、王師郎（應為「琅」之誤）、劉傳來、周榮華、尤明哲、莊守、孫口蘭（口表字跡無法辨識）、余進才、藍煥呈、陳越、黃樞、張文環、張深切、謝伯齡、黃師樵、莊春火、彭宇棟、莊泗川、劉松甫、盧新發、林襟之、高兩貴、陳坎、林明德、張阿犁、李金祿、黃聯登、吳海水、蘇泰山、黃賜、陳玉瑛、林兌、黃阿乖、楊克煌、陳金波、劉守鴻、蘇德興、謝少塘、江水得、黃對、歐陽得水、吳新榮、施禎祥、李振東、湯接枝、呂新進、褚沅進、楊順利、馬有岳、蔣源盛、游金泉、林榮振、蔡葛、許嘉裕、吳文身、鄭聯捷、蔡狄木、廖九芎、林海成、王天強、許碧珊、周宗河、賴明煌、張士德、鄧阿鳳、林万根、楊春榮、廖□□、徐金湖、林營輝、周營福、陳培初、陳百合、李木芳、廖弈炎、廖亦富、黃溪。由名單可見遺族救援委員會幾乎網羅當時遍布台灣各地，曾經活躍於社會運動與文化活動的抗日菁英。

為替奉安典禮宣傳，楊達執筆〈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六月十七日の前後——忠烈祠典禮を紀念して〉），⁶³自6月17日起分兩日連載於《新生報》。文章一開始，楊達即以日本殖民統治者所謂的「始政紀念日」是抗日志士內心哭泣的紀念日，將之稱為「死政紀念日」。楊達說每當他回想起6月17日這個日子，首先浮現腦海的便是清國官員把台灣人連同其山河出賣給日本，以及祖先創建東洋第一個民主國，對抗日本不屈不撓的抗爭行動等事蹟；除此之外，就是台灣第一號漢奸辜顯榮的名字。楊達引據日本政府文獻，詳細說明辜顯榮請求日軍鎮壓台北附近蜂起的土匪，自願擔任日軍進入台北城的嚮導，日後從殖民當局獲得許多利益，包括被勒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一事。楊達又說當時一些外國人與辜顯榮等漢奸很快地追隨日軍，充當日本人的間諜，調查並計誘猖獗的「土匪」，楊達對此特別解釋說：

這裡所指的「土匪」是誰呢？

事實上，就是50年來用鮮血染紅台灣革命史的革命先烈與志士。他們對

63 由於筆者近年內才發現這篇文章，因而未及收入《楊達全集》，目前該文亦未曾見諸其他研究。

那些逃得快的清朝文武官員相當失望，想要憑藉自己的力量以及現成的武器捍衛山河，他們是悲壯人民的自衛軍。

在日本有所謂「勝者為官軍，敗者為賊」的諺語。在台灣稱之為「土匪」或「匪賊」。為了屠殺革命志士，侮辱革命志士，連「匪徒刑罰令」都創立出來。不過此等事並不只是日本軍閥的專利，這和滿清把太平天國的革命稱之為「長毛賊之亂」，把孫國父稱之為「賊」，到了現代，軍閥將人民革命的勢力稱為某匪、某賊……是共通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此，我們「冒死揭開」這些事蹟，紀念先烈之際，首先必須著手處理的事情就是將被冠上某某匪、某某賊的名字□□（字跡模糊，無法辨識），公開那些被屠殺者的事蹟，藉此將人民被扭曲掉的認知匡正過來。⁶⁴

這段文字說明了忠烈祠奉安典禮的意義，首先在於以人民的立場替被稱為「土匪」的先烈進行平反。在訴諸民族主義的表象背後，更值得注意的是提及現代軍閥亦將人民革命勢力貶為「匪」或「賊」，其中深藏楊逵個人對於當權者的批判與抗爭的意識。

如果把楊逵該文中提到因武力抗日被處死刑的吳得福、周扁、王祿、王清等四名，與前述「調查表」中亦有被調查先烈未在6月17日當天入祀桃園忠烈祠配合來看，顯然得否入祀是經過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以某種標準再次評選的結果。由此看來，入祀的72名先烈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在數字上的雷同可能並非巧合。果真如此，那麼把致力於將台灣從異族手中解放的志士與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犧牲的革命黨人等同類比，並且以抗日左翼運動陣營者為主要對象進行隆重的追思與紀念，其所突顯的台灣主體性歷史意義不言可喻。

奉安典禮進行完畢之後，遺族救援會的任務告一段落。同年年底劉啟光離開新竹縣府，轉任華南商業銀行籌備處主任委員，並於1947年2月26日當選華南商業銀行理事長。⁶⁵從此遺族救援會未見任何活動，形同解

64 譯自楊逵，〈六月十七日的前後——忠烈祠典禮を紀念して〉（上），《台灣新生報》，1946.06.17。

65 〈各縣市長部份更調 劉啟光辭職·劉存忠免本職等 省公署日昨正式發表〉，《民報》，1946.12.14；〈華南商業銀行開董監事會議 劉啟光當選理事長〉，《民報》，1947.02.28。

散。1946年9月27日政治建設協會台中分會成立，⁶⁶楊逵加入並擔任監事一職，⁶⁷這是戰後初期楊逵最後參與的政治團體。

五、投身武裝革命

戰爭結束僅約一年的時間，台灣社會在不當統治下漸漸陷入民生凋弊、經濟混亂的局面。1946年8月，楊逵一連發表兩篇文章抨擊陳儀政府。8月1日，他以〈傾聽人民的聲音〉呼籲當權者切莫陶醉於被製造出來的虛假輿論，必須從茶餘飯後、路邊田裏和街頭巷尾中細心找尋，傾聽人民真正的心聲，從健全的輿論當中建立健全的政治。8月15日，戰爭結束正好屆滿一年，楊逵再以〈為此一年哭〉清楚描述失望悲痛的心情，他說：

在此一年間，我們做些什麼呢？記得去年的今日，我聽著日皇投降的電訊，感動到汗流身顫，是覺得我們解放了，束縛我們的鐵鎖打斷了，我們都可以自由的生活。

我相信我們心未死，有所為，很多的朋友都說：我們要同心協力建設一個好的新台灣，但是結局如何呢？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業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豬母乳」炒菜補，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成一個什麼世界呢？

說幾句老實話，寫幾個正經字却要受種的威脅，打破了舊枷鎖，又有了新鐵鍊。結局時間是白過了，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坐食，總要覺得慚愧，不覺地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⁶⁸

回顧戰爭甫結束時曾經以無比興奮激動的情緒，立志與眾人同心協力建設台灣；一年後卻要面對失業率居高不下、貪官污吏與奸商橫行的世界。於是在對當局極端失望的心情之後，楊逵立下以實際行動自動爭取民主的新誓約。

1946年底，楊逵藉魯迅名著〈阿Q正傳〉中的阿Q畫圓圈，小心翼翼地縫

66 〈政治建設協會台中分會成立〉，《民報》，1946.09.27。

67 見表格「政治建設協會台中分會理監事一覽」，何義麟，〈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頁180。

68 原載於《新知識》創刊號，1946.08，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229。

合圓圈以免成為行狀上的汙點，結果圓圈還是少了一角，就像禮義廉恥之邦少了一個「信」字，諷刺陳儀政府失信於民。他說：

禮義廉恥之邦，在這一年來給我們看到的，已經缺少了一個信字，圓圈欠了這一角，在阿Q總要一抖一抖的使其合縫，不幸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是他生怕被人笑話，以為「行狀」上的一個污點的。

禮義廉恥之士的靈魂與思想，比不上阿Q的生怕被人笑話，在欠少做人條件的我們看來，却有点心酸。打倒敵人以來，時間已經過了不短的一年餘了，我們總願結束了一番武劇，來編排一齣建設的新戲，拖來拖去總難得使這個圈畫得圓的。我們平民凡夫都是要看所謂「幸福結尾」的大團圓，一齣劇要演到大團圓，總不得在「路絲腳」的戲台上演，雖有幾個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動亂之下再發其大財，平民凡夫在飢寒交迫之下總會不喜歡他們的。⁶⁹

楊逵以飢寒交迫的平民對比亂世中發財的欠信之人，已經明確表達對於執政當局的不滿。兩個月後，台灣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而陷入更大的動亂，楊逵毅然選擇站在人民的一邊對抗政府。

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煙不當，造成毆傷煙販林江邁，並射殺青年陳文溪的不幸事件，次日民眾為此到行政長官公署示威抗議，不料竟又遭到機關槍無情掃射，全島性的反抗運動旋即引爆，史稱「二二八事件」。為盡快弭平紛爭，台灣仕紳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緝煙血案的消息傳到台中，楊逵與莊垂勝、葉榮鐘、何集璧等人決定利用政治建設協會台中分會擬在3月2日舉辦的「憲法推行大演講會」，擴大召開市民大會，共商對策。3月1日，楊逵等人於中央書局二樓設「輿論調查所」，製作意見調查小卡以測知民意，並通知台中地區民眾，次日將於台中戲院擴大召開市民大會，⁷⁰當天也就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之日。

關於市民大會召開當時的情形，楊逵的回憶說：

二日上午，許多民眾湧往會場，但見戲院大門緊閉，門板上貼告示一

69 楊逵，〈阿Q畫圓圈〉，原發表於《文化交流》1輯，1947.01.15，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231-232。

70 《楊逵全集》「資料卷」，頁82；《辛酸六十年》，頁434。楊逵回憶中將「政治建設協會」誤記為「政治建設促進協會」。另根據《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1日的報導，3月2日擬進行之演講會為「憲法推行大演講會」，楊逵回憶中誤記為「憲政研討會」。

張：市民大會暫停召開。民眾失望、抗議；後來人群愈聚愈多，有人撕下告示，猛擊門板，威脅如不開門，就要踐破門板；僵持一會，戲院一方讓步，打開大門，群眾湧入。（事後才得知，那告示是市政府派人貼的。）我雜在會場門外人群中，見大會順利召開後，才離去。⁷¹

鍾逸人對這一段往事則有全然不同的記憶——他記得群眾進入戲院後，上台的人中「謝雪紅及她們『人民協會』的人也有五、六個」；而演講一事，「楊達是當然要出來的人」，至於楊達站在台上演講的情形是：

他講了半天，到底講些什麼？大部分的人都聽不懂，因為場裏人多嘈雜，他的嗓音又很低，尤其當時是還未有裝設擴音機的時代。⁷²

鍾逸人並詳細追憶當天人民協會派的人馬刻意安排，導引群眾將謝雪紅推為主席的情形，而此時——

楊達冷眼旁觀此景，雖然明知這是「人民協會」的一貫手段，早已習而不怪，臉上卻仍不免露出一點鄙視和輕蔑的表情。

楊達發現我站在舞台左側銀幕後面，便示意我到後面，找一個可以談話的地方。剛找來兩個凳子坐下，商議一些大會結束後，如何遊行，抗議書由誰起草抄寫等問題時，忽然間聽到外面一陣急迫怒叫的聲音，整個會場開始騷動。⁷³

鍾逸人對兩人商談過程有如此清楚的記載，楊達上台演說應該是歷史事實。曾為楊達回憶錄擔任筆記的王麗華也提到：楊達的某位老友堅持市民大會上楊達曾經上台演說，因此她懷疑楊達本人堅決的否認，不知是記憶失真或仍有忌諱？⁷⁴眾所皆知，陳儀政府後來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推給共產黨，戒嚴時期只要與共產黨扯上關係，通常會落到槍斃的下場。而當天人民大會由共產黨的謝雪紅擔任主席，會後民眾包圍台中市警察局，解除警察武裝。謝雪紅以警察的武器編組學生起義軍，緊接著宣布「人民政府」成立。⁷⁵楊達晚年可能擔心因

71 引自〈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楊達全集》「資料卷」，頁82。

72 引自《辛酸六十年》，頁450-451。

73 同註72，頁453。

74 筆者懷疑王麗華所說楊達的某位老友即是鍾逸人。有關王麗華的說法見《楊達全集》「資料卷」，頁87。

75 參見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 I（1945-1965）》（台北：業強，2001），頁32。

此再度入獄，於是在自我保護的前提下不得不隱瞞真相，並非記憶失真。

3月2日市民大會召開當天下午，台中縣市、彰化市參議會及仕紳代表們齊聚台中市參議會，成立「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並編組青年學生為「治安隊」。晚間因風聞陳儀從台北派兵南下，處委會的仕紳紛紛走避，台中市議長黃朝清乃下令解散處委會及治安隊。而謝雪紅把尚未離去的學生組織起來，收繳警察的武器，並佔領廣播電台，向中部地區廣播各地起義的情形，呼籲民眾群起響應。⁷⁶當晚，楊逵撰寫〈大捷之後〉，原擬在《和平日報》刊載，遭編輯陳洗（陳正坤）拒絕。鍾逸人從編輯處取回稿件，交給工務課排版，改以「號外」方式沿街叫賣。⁷⁷該文長約一千多字，內容主要是「苦勸民眾不可得意忘形，必須理智團結」。⁷⁸可惜這篇作品亡佚，無法得知更為詳細的內容。但顯然楊逵已有了重大的抉擇，他毅然踏上武裝抗暴之路。

3月3日，鍾逸人成立「民主保衛隊」。3月4日，台灣仕紳及人民團體代表獲悉中部地區已在民軍控制之下，重新組織「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並設有保安委員會負責作戰。但因其目標在於改革省政，與謝雪紅訴求台灣自治的步調不一，逐漸趨於消極與妥協。⁷⁹3月6日在台中干城，原有的武裝部隊重新編整，為紀念緝煙血案發生於2月27日，取名為「二七部隊」，⁸⁰由謝雪紅任總指揮，鍾逸人為部隊長。截至3月8日為止，台中市的官方機構都在民兵的控制之下。

約3月5日或6日左右，楊逵赴《和平日報》辦公室，向王思翔等人傳達台中「處理委員會」的意見，要求已停刊的《和平日報》恢復出刊。王思翔對這

76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86-87。

77 楊逵的回憶說：「文章原擬在某報刊登，但被編輯拒絕，後來改以油印發送。」（《楊逵全集》「資料卷」，頁83）根據鍾逸人的說法，所謂「某報」即是《和平日報》，楊逵被編輯拒絕刊登之後，鍾逸人藉口要求退稿，從編輯處取回稿件，交給工務課排版。接近清晨兩點時已印好一千五百多份，鍾逸人以「號外」方式叫賣，約四點半賣完（《辛酸六十年》，頁459-461）。筆者在台南市立圖書館找到《和平日報》原件，3月2日照常出刊四版，並未見〈大捷之後〉一文，可見此「號外」確為另外發送。為此，和平日報社以「編輯部」名義於事件平定後的3月15日刊登〈緊要啟事〉，宣稱「自3月2日起因編輯人員即被集中保護，不能外出，直至12日下午5時始恢復自由行動，其間2日所出號外及8日至12日報昏中，間有跡近反動言論，皆由外方自行刊入，在編輯部人員失去自由行動期間，該項言論，本報自不負任何責任」。

78 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459。

79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89-91。

80 鍾逸人宣稱二七部隊為他本人於3月4日成立，陳芳明已根據史實，證明鍾逸人記憶有誤。參見《辛酸六十年》，頁480；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1994），頁327-328。

一段歷史的回憶是：

當時李上根和韋佩弦不在台中，報社由副社長張煦本和總編輯陳洗（即陳正坤）負責，我同張、陳二人商量後再和楊遠研究決定：暫時出版《和平日報（台灣版）》半張，即對開二大版，由我和楊遠共同負責，吸收自願參加工作的編輯、校對和電訊室人員，以刊載省市新聞為主要內容，在市內發行。此後數日，楊遠每天來報社主持工作，經常帶來一些代表群眾組織具有一定指導性的文稿（有些是他自己化名寫的）交編輯人員編發，儼然是受謝雪紅或某一位不公開出面的群眾組織領導人的委託來負責宣傳工作。他對我友好如前，曾把他化名刊登在《自由日報》上的一篇長文和一篇呼籲開闢農村工作的文章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他在文章中呼籲建立和擴大「除貪官污吏猙獰惡霸之反對派外的民主統一戰線」，並且提出「必須以武力為後盾」。我以為，他的這些論點與謝雪紅等共產黨人是一致的，但不過書生的紙上談兵而已。⁸¹

上述王思翔提到的呼籲開闢農村工作的文章即是〈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楊遠因當時擔任台中起義群眾組織工作而起草這份文件。由於記者缺乏經驗，署名「楊遠」發表於3月9日的《自由日報》。除了在報紙公開發表之外，也印成單頁傳單散發，作為指導性的文件。⁸²文中楊遠建議當務之急在於組成下鄉工作隊，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的工作，以保持無盡的預備軍，發揮人民的力量。在分項敘述工作原則時，第一條主要是呼籲市民控制下的都市地區須包容各種黨派，擴大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致以追求民主自由。從第二條開始，楊遠針對組訓方法提出實際執行之道，內容如下：

第二，下鄉工作隊可以三人——五人為一組，分發各區，在地聯合當地智識分子，進步而有熱血的青年，開始宣傳、組織、訓練工作。進而與鄉鎮公所與警察合作，推行自由無限制的選舉，產生鄉鎮區自治。

第三，在此工作的第一對象，就是鄉鎮中堅青年，以十人為一小隊，五小隊為一中隊，二中隊以上為一大隊，這可以叫做鄉民或鎮民保衛隊，而保衛隊須要隨時可以趕到他鄉鎮以至都市去應援。但，平時須要協助

81 引自王思翔，〈台灣一年〉，周夢江、王思翔著，葉芸芸編，《台灣舊事》（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35。

82 參考王思翔的回憶，原收入陳芳明編，《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台北：二二八和平促進會，1991），頁289；《楊遠全集》「詩文卷」（下），頁241。

農家生產或是合作生產，以圖自食其力。

第四，第二的對象就是以鄰里或是村鄉鎮為基礎地域的自衛團，這自衛團，原則上不移動，只要自衛自己的鄰里，或是村鎮。這鄰里或村鎮須要附屬合作工作或是相互工作，以增加生產與防衛。

第五，第三就是婦女、工人、學生、教員等各界的組織，進而取得各界可以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互相看護。⁸³

文中提出經由下鄉培訓青年的方式達到台灣自治的最終目的，這是做為社會主義信奉者的楊逵又一次將理念付諸於社會實踐。楊逵並身體力行這樣的理念，與葉陶攜手走入鄰近鄉鎮組訓農村青年，再把他們一批批地送到二七部隊。⁸⁴ 楊逵沒有半點知識分子的驕氣，真心誠意與民眾站在一起，不愧是一位行動派的文學家。

至於王思翔所說另一篇刊登在《自由日報》上的長文則是〈二·二七慘案真因——台灣省民之哀訴〉，實際上是3月8、9日同時刊載於《自由日報》與《和平日報》。本篇亡逸已久，2003年8月曾健民等人在北京圖書館發現原件，2004年2月2日於南寧召開的「楊逵作品研討會」上首度公開，後並收錄於當月出版的《文學二二八》一書中。⁸⁵ 本篇在《自由日報》發表時，3月8日署名「台中區時局處委會稿」，9日則署名「一讀者」；《和平日報》發表時，3月8日署名「一讀者」，3月9日部份尚未出土。全文要點在於說明以二二七緝煙慘案為導火線，全台民眾崛起義舉完全出自愛國心，控訴政府迷誤不醒，以暴動之說掩飾罪行，推諉責任於台灣人民要做外國的殖民地；並強調民眾義舉之目的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離叛祖國或做外國的殖民地。根據王思翔的說法，楊逵曾親口告訴他本篇為楊逵所作；⁸⁶ 然以日文創

83 《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240。

84 〈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全集》「資料卷」，頁82。鍾逸人亦有同樣的回憶，證明楊逵所言不假，見「楊逵原來潛鄉組訓去」的記載，《辛酸六十年》，頁512。

85 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合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4），頁344-345。

86 曾健民在〈關於楊逵和〈二二七慘案真因〉〉一文中曰：「據當時在台中《和平日報》任編輯工作，楊逵的友人張禹（原名王思翔）的回憶，和楊逵本人的回憶，楊逵在二二八期間曾有二篇文章刊載於報刊上，一是〈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另一是〈二二七慘案真因——台灣省民之哀訴〉。」（《文學二二八》，頁344）然筆者遍查史料，均不見楊逵提過〈二二七慘案真因——台灣省民之哀訴〉這篇文章，或說過這是由他所作之類的話。而王思翔說楊逵曾親口告訴他本篇為楊逵所作，則見諸〈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一文後王思翔的按語，《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二二八事件專輯》，頁289-290。

作揚名文壇的楊逵當時中文能力不佳，同年1月間發表於《文化交流》的〈台灣新文學的二位開拓者〉仍需仰賴王思翔為其改稿，⁸⁷〈二·二七慘案真因〉文辭之洗鍊、排比句型之眾多，以及成熟順暢的北京話語句，實非楊逵當時能力所及，很可能是楊逵起草後交由他人代為潤飾而成。

六、楊逵與人民協會的路線之爭

二二八事件原是民變，並非由那一個黨派所策劃與領導，但是謝雪紅掛名二七部隊的總指揮，參與者有共產黨重要幹部絕對是不爭的事實。被王思翔視為與謝雪紅等共產黨人意見一致的〈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其實恰好透露出楊逵和謝雪紅在戰術運用方面有其差異。例如楊逵在文章的起始處說：

因台中市民起義，掃蕩貪官污吏奸獍惡霸而鬥爭，義民四起，踴躍馳援，員林隊、彰化隊、豐原隊、埔里隊、大甲隊等，均已趕到參加戰列。這樣實情可以看出普遍人民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

另有消息可以相信其他各地也在陸續編隊以待，我們雖須要集中勢力，但過度集中於一據點者，在工作上有點不利，自今天起，我們須要組織下鄉工作隊，到鄉鎮去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工作，這樣去做我們才能保持無盡的預備軍，才可以展開高度普遍工作，發揮我們的力量。⁸⁸

查考歷史記載，3月3日上午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組織「人民大隊」的民軍，台中市成為中部地區反抗運動的重要據點。3日下午，共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埔里隊、東勢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等先後到達台中，增援民軍。⁸⁹在各地民眾踴躍奔向謝雪紅，人民力量集中到城市的同時，楊逵卻為文反對過度集中於某一據點，極力呼籲下鄉工作，等於向謝雪紅領導的陣營潑一盆冷水。與共產黨員的謝雪紅同樣站在武裝抗暴、爭取台灣自治的一邊，為什麼楊逵會和謝雪紅唱反調？楊逵在武裝革命路線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否接受共產黨的指揮？尤其他在事變中與謝雪紅，及與共產黨的關係究竟如何？凡此種種，無不令人感到好奇。

87 王思翔，〈楊逵·《送報伙》·胡風〉，《台灣舊事》，頁93。

88 《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239。

89 綜合參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87；蘇新，《憤怒的台灣》，頁129-130。

戰後初期台灣地區的共產黨活動大約可分成兩派，一派是以蔡孝乾為主的中國共產黨；另一派是以謝雪紅為主的原台灣共產黨員。不僅蔡孝乾、謝雪紅是楊逵舊識，當時在台灣活動的這兩派成員亦大多為楊逵社會運動時期的同志。關於楊逵是否共產黨員的問題一直眾說紛紜，葉石濤曾多次問他，被問急了的楊逵總是以「看《警察沿革志》不就得了」來回答。⁹⁰《警察沿革志》成書於1939年，其中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台灣社會運動的相關記錄。事實上該書並沒有明確記載楊逵有否具備共產黨員的身分，但葉石濤始終認定楊逵是台灣共產黨員；而與楊逵在戰後初期有密切往來的周夢江則是說，據他所知當時的楊逵不是台灣共產黨員，⁹¹楊逵好友鍾逸人也有楊逵不是共產黨員的說法。⁹²楊逵生前亦曾一再公開宣稱自己並非共產黨員，例如他曾在訪談中解釋與台共的關係時說過：當年他大約知道農民組合中誰是台共，但未與他們密切接觸，因為他對文學懷抱著一種使命感，不能轉入「地下」；⁹³在提及自己與蔡孝乾的關係時，楊逵也說：

孝乾在台灣是做地下工作，我不是共產黨員，是公開的，我們互知道一點點，但並不知道他的實在情形，因為我公開，隨時會被抓，因此他有事也不讓我知道。⁹⁴

雖然近年間藍博洲調查發現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共在台地下黨人有所接觸，⁹⁵吳克泰也以楊資崩的回憶，大膽推論楊逵跟蔡孝乾有正式的組織關係，⁹⁶但目前

90 葉石濤，〈楊逵與台共的關係〉，《走向台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1990），頁93。

91 周夢江，〈記楊逵二、三事〉，《台灣舊事》，頁105。

92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頁399。

93 參見〈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全集》「資料卷」，頁79。

94 引自〈二二八事件前後〉，《楊逵全集》「資料卷」頁95。

95 根據藍博洲的調查研究，除目前已知的蔡孝乾、張志忠外，與楊逵曾經有所往來的中共地下黨人還有辜金良、賴瓊煙、張金爵、張彩雲、許分、蔡鐵臣、施部生、呂煥章、何集淮與「民生會」會長廖金和。其中辜金良與楊逵相識於楊逵蟄居高雄內惟期間，1936年曾與許分前往台中協助《台灣新文學》雜誌社相關事務；其餘年輕人大多從日治末期的首陽農園時代便圍繞在楊逵身邊，後來成為《一陽週報》到「新生活促進隊」的核心成員。詳見藍博洲，〈楊逵與台灣地下黨關係的初探〉（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2004.02.02-03）。

96 吳克泰說楊資崩生前曾經告訴他，楊逵臨終之前蔡孝乾曾赴桃園大溪見楊逵，並對楊逵說：「老楊啊，我沒有出賣你呀！」吳克泰據此以為：「這不是說明蔡孝乾1950年被捕以前同楊逵之間有正式的組織關係嗎？」然而筆者以為這樣曖昧不清的話語，尚不足以證明楊逵為中共黨員。引文見吳克泰，〈楊逵先生與「二·二八」〉（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2004.02.02-03），頁3。

並沒有任何史料足以證明楊逵曾經加入台共或中共。

1945年9月20日，謝雪紅在台中市組織「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冀望以之對抗國民黨政權。10月5日「台灣人民協會」在大華酒家正式成立，11月17日陳儀頒布〈台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以眾多的人民團體中有不良份子藉口聚眾，荼毒鄉里者，使社會治安益形紛亂，勒令所有民間團體全數解散，重新登記。不過台灣人民協會仍維持運作，謝雪紅並藉此散播其政治影響力。⁹⁷根據鍾逸人的說法，謝雪紅的人民協會曾經邀請楊逵擔任某個職務，但遭到婉拒。1947年2月間，來自東北的中國共產黨員陳本江⁹⁸曾向鍾逸人詢問楊逵與謝雪紅交惡的經過，試探是否有辦法促使兩人合作。⁹⁹古瑞雲（後改名周明）也聽說人民協會籌辦期間楊逵是籌備委員之一，後因意見分歧而退出，詳細原因不明。¹⁰⁰葉石濤則回憶楊逵從不否認和謝雪紅很熟，但他埋怨謝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濃厚，缺乏務實的態度，太虛榮，似乎兩人在性格上有格格不入之處。¹⁰¹至於楊逵本人對他光復後不在大華酒家（人民協會）走動的解釋是：

（1）我和雪紅仔那批人的路線，本來就不合。

（2）有回在公開場合，謝雪紅向我批評葉陶「草地查某一個」，無啥氣質——。我聽後覺得雪紅仔伊別有用心。¹⁰²

另外，謝雪紅曾親口對古瑞雲（周明）說：3月1日，楊逵和鍾逸人印發傳單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由於傳單未署名，謝雪紅並不知是楊逵等人所為。同一日，謝雪紅與楊克煌召集人民協會幹部的林兌、謝富、李喬松等人研究對策。3月3日，自發性組成的武裝部隊攻克台中市黨政軍憲各機關，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重新組織起來，並邀謝雪紅加入擔任委員，企圖控制武裝部隊。謝雪紅在負責嘉義地區武裝工作的張志忠勸說下與處委會合作，想借助其中部分人士的聲望與影響力籌措糧食及款項，但私底下則盡力防止處委會妥協和投

97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文化，1998），頁770；蘇新，《憤怒的台灣》，頁114-116；陳芳明，《謝雪紅評傳》，頁253-290。

98 時任《中外日報》編輯，見古瑞雲（周明），《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1990），頁41。

99 見〈瓦窰寮裏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03.29；《辛酸六十年》，頁424。

100 古瑞雲，《台中的風雷》，頁22。

101 葉石濤，〈楊逵與台共的關係〉，《走向台灣文學》，頁95。

102 〈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楊逵全集》「資料卷」，頁82。

降，甚至視其為絆腳石。和鍾逸人欲以武力迫使陳儀接受處委會的條件不同；謝雪紅是想建立全島性的人民軍隊，進而建立自治聯合政府。3月3日，謝雪紅致函台中各報社，要求以「人民政府」名義發佈安民告示，楊克煌並著手起草人民政府的宣言、政治綱領、組織法等相關文稿。¹⁰³

楊逵自述二二八事件期間被處委會派任負責宣傳部，隨時印發傳單。台中的局勢被處委會控制期間蔡孝乾曾與他連絡，打算辦「人民日報」或組織游擊隊。楊逵以國民黨大軍開來眾人就會散去的理由表示反對，建議辦流動性的週刊或半月刊，乃撰寫〈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呼籲下鄉以擴大控制面。雖然兩人意見不合，蔡孝乾仍有一個小組組織做通訊員，與楊逵保持聯絡。¹⁰⁴從這樣看來，當時楊逵與蔡孝乾之間的來往實較與謝雪紅之間密切得多。雖已預見武裝反抗終將歸於失敗，但楊逵仍盡力為二七部隊開拓兵源，無非是想藉此逼使國民政府改善政治，促成台灣的自治，並不想以武力長久對峙，這就是楊逵晚年回憶說自己始終反對以武力解決問題的主要原因所在。¹⁰⁵以上種種跡象都顯示楊逵與謝雪紅意見相左，武裝抗暴當時並非同一路的人馬。不過楊逵既未和蔡孝乾等共產黨人士完全合作，也不是完全聽命於處委會，應該說他是一方面和同樣反對陳儀政府的人士或組織有條件合作，另一方面和葉陶夫婦倆靠自己判斷行事，這也是他所說的包容各界、擴大民主統一戰線的實際做法。

毫無疑問，楊逵與謝雪紅確因彼此間的嫌隙而未能合作無間，其中原因則應追溯至日治時期，謝雪紅領導對連溫卿、楊逵的鬥爭，導致楊逵被逐出農民組合。再者，戰爭甫結束時部分日本軍人與台灣仕紳密謀宣佈台灣獨立，風聞林獻堂也捲入其中的楊逵前往霧峰林家求證，卻遭人民協會派的人馬誣指參與其中，楊逵認為這是與他之間有個人恩怨的簡吉藉機打擊他。雖然不久即真相大白，楊逵與人民協會派本已不睦的關係從此更形惡化。¹⁰⁶另外，鍾逸人回憶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當他離開二七部隊，潛逃二林，與楊逵夫婦訴說謝雪紅在埔里拋頭露面，引起當地居民不安，情勢已不可為，說明未完，葉陶即已

103 同註100，頁51-59。

104 〈二二八事件前後〉，《楊逵全集》「資料卷」，頁90。

105 楊逵說：「不管在從事反對日人的社會運動，抑或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發生的一次事件中，我始終反對以武力、暴力來做為解決問題的意圖。」戒嚴時期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討論是觸犯政府禁忌的話題，因此楊逵以「二次大戰結束後發生的一次事件」代稱「二二八事件」。見〈我的回憶〉，《楊逵全集》「資料卷」，頁53。

106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517-518。

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謝雪紅「風頭主義，敗事有餘成事不足」，¹⁰⁷顯示葉陶與謝雪紅也關係不睦。不過，根據謝雪紅與楊逵週遭人士的回憶，楊逵一家人與謝雪紅當時來往雖不熟絡，事實上也並非毫無往來。例如楊建（楊逵次子）還清楚記得葉陶曾經帶他去過大華酒家；¹⁰⁸王思翔也記得葉陶曾經到過謝雪紅住處，兩人關係尚好；1949年楊逵因〈和平宣言〉入獄之後，當時已在中國的謝雪紅還曾經遺憾沒能幫助楊逵逃亡大陸，¹⁰⁹對楊逵有著一份惺惺相惜之情。因此可以確定楊、謝兩人二二八事件前後無法合作，係肇因於思想路線與性格的不合。

3月8日，南京政府的援軍抵達基隆，立即進行瘋狂大屠殺。9日，見大勢已去，楊逵、葉陶逃亡於中部一帶。¹¹⁰4月20日，筋疲力竭的楊逵夫婦返家同遭逮捕，並經歷了面臨死刑的恐怖經驗。由於新任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政策轉變，非軍人者改以司法審判，而於八月份釋放，繫獄一百零五天。¹¹¹出獄後的楊逵夫婦因對國民黨失望，黨費未繳而退出中國國民黨。¹¹²死裡逃生的楊逵非但沒有被這次的挫敗擊倒，反而更加積極參與藝文活動。由於不諳北京話，應邀參加座談會和演講會時就由大學生擔任翻譯，以此與外省知識分子重新展開交流，也因而促成楊逵與學生運動頗有淵源，尤其是當時名聲大噪的「麥浪歌詠隊」。

七、楊逵與麥浪歌詠隊

麥浪歌詠隊的前身是成立於1946年，以演唱「黃河大合唱」而著稱的黃河合唱團，由台灣大學的學生與青年軍共十幾人組成，二二八事件之後擴充為約有30、40人（或說80、90人）的學生文藝社團，因為隊員中有許多人來自北

107 同註106，頁596。

108 〈楊建先生訪談記錄〉，〈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398。

109 見王思翔寫給陳芳明的書信，收於《謝雪紅評傳》，頁268。

110 筆者曾經引用楊逵親友的回憶，為楊逵的逃亡歷程拼湊出些許輪廓。詳見〈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218-221。

111 〈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頁83；〈二二八事件前後〉，頁91-95；《辛酸六十年》，頁631。楊逵為二二八事件坐牢105天係根據他自己的回憶，參見由其口述的〈我的心聲〉，楊翠筆記，原載於《自立晚報》，1985.03.29，收於《楊逵全集》「資料卷」，頁67。

112 〈楊建先生訪談記錄〉，〈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399。

方，看過隨風浮動的麥浪，而取名為麥浪歌詠隊。1948年12月底，為了替台大全校學生自治會聯合會籌募福利基金，曾連續三天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演出曲目有〈黃河大合唱〉、〈祖國大合唱〉、歌劇〈農村曲〉（三幕），大陸民間歌謠與流行歌曲〈王大娘補缸〉、〈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朱大嫂送雞蛋〉、〈團結就是力量〉、〈一根扁擔〉，以及當年大陸學生運動中風行一時的〈跌倒算什麼〉、〈你是燈塔〉、〈光明組曲〉、〈青春戰鬥曲〉等。由於當時的台灣充斥著日本歌曲與西方音樂，這些學生用樸實的聲音唱出中國與台灣本地的曲調，舞出人民真正的生活，促成大陸與台灣文化的交流，遂因而在文化界激起熱烈的迴響。¹¹³

1949年2月9日起，麥浪歌詠隊從台北出發，展開巡迴表演，9日起在台中國際戲院接連兩天表演三場。¹¹⁴2月8日，台中地區發行的《台灣民聲日報》在「新綠」欄第139期製作專輯，為麥浪歌詠隊的台中之行預做宣傳，共刊出張朗〈麥浪舞蹈〉、蘇榮燦（黃榮燦）〈歌謠舞蹈做中學〉、塞兒〈關於「控訴」〉，以及未署名作者的〈你就是王大娘〉四篇文章。其中對於麥浪的介紹多著重在來自民歌民舞的演出曲目如何反映人民的心聲，例如〈麥浪舞蹈〉說人民的舞蹈「可以訴出自受的不幸，可以表達出迫切的願望」，基於這種原因，作者說他：「相信舞蹈在爭取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會成為一支極有力的利器」；〈關於「控訴」〉提到唱民歌是因為「民歌能表現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在這激變的時代裏，人民的願望將是民主的唯一的準則」；〈你就是王大娘〉介紹演出節目之一的河南民謠「王大娘補缸」，作者認為王大娘遭受封建和內戰的雙重桎梏，而她所說的「物價再漲，老百姓遭災殃」顯示了人民因戰爭而產生的恐慌和焦急。上述這些文字都足見麥浪歌詠隊之大受歡迎，實有其反對中國內戰和追求民主的現實意義。

此外，「新綠」在該專輯中特地刊出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我們到台中來〉，藉由這篇文章，學生們說明演出之目的在於介紹並且推廣各地的民間歌舞，文宣中還說：

- 113 綜合參考藍博洲，〈秧歌·台北——台灣新文藝運動的青春之歌〉、以及方生（陳實），〈楊遠與台灣學生民主運動〉，《新文學史料》（北京，2001.02），頁18-25及頁68-71；以及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以下有關麥浪歌詠隊的論述亦同。
- 114 1949年2月4日起，麥浪歌詠隊從台北出發，展開巡迴表演。參見〈台大麥浪歌詠隊在台中表演〉，《台灣新生報》，1949.02.09；〈台大麥浪歌詠隊在台中市演出觀眾擁塞〉，《中華日報》，1949.02.11。

我們知道民間歌舞是人民勞動動作的影響和表徵，它的情調原是健康，熱情，而充滿活力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間歌舞便被有閒的資產階級的淫蕩，萎靡，頹廢的音樂和舞蹈排斥而淪落而終究默默無聞，而在今天這種音樂卻（按：「卻」之誤）反而毒害著廣大的人民意識了！我們認為健康的歌和舞是健康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意識必須更有勞動的積極性，它必須鼓勵起人民勞動的熱情，鍛鍊人民的集體勞動意識，能更高度的激發人民進取創造的精神，我們熱誠希望台中各界熱心的人士們，各校同學們，靠攏起來，組織起來，共同為推廣民歌民舞而努力，同時我們更希望大家對於我們這次演出給予我們熱烈的批評和教訓。¹¹⁵

藉此，麥浪歌詠隊充分表現對於民間歌舞勞動性與社會意義的重視，以及團結組織各校學生來共同推廣民歌民舞的誠意。

楊達不但對麥浪赴台中演出表達熱情歡迎之意，並聯合當地文化界人士協助解決隊員在台中、台南的表演場地和住宿等問題。由於演出曲目缺少台灣本地歌謠，楊達建議增加台灣民謠的表演，並推薦長子楊資崩與許肇峰兩位本地籍學子共同演唱〈補破網〉，麥浪的台籍團員林達文也另外表演了〈收酒斫〉，於是在台中的演出曲目除了中國民歌之外又加進了本地歌謠，從此台灣本地民歌被包含在該社團固定表演的曲目之內。¹¹⁶麥浪在台中表演的〈收酒斫〉與〈補破網〉兩首台灣歌曲皆為戰後初期全新的創作，前者由張邱冬松作於1946年，敘述一位十多歲的台灣少年收購破銅爛鐵廢紙維生的悲苦，因為充分反映民眾建設台灣理想幻滅的心情而流行許久，大街小巷傳唱不絕；¹¹⁷後者的歌詞部分則由李臨秋作於1948年，作者自述創作動機是希望與鬧翻的女友彌補破碎的愛的希望，不過因為歌詞「漁網」與「希望」台語音相近，被視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民眾期盼修補殘破的社會之象徵。麥浪歌詠隊臨時增加這兩首歌謠，使其演出更為貼近台灣民眾。

2月10日上午，楊達又另外安排銀鈴會成員朱實、林亨泰、蕭翔文等人在台中圖書館，舉辦名為「文藝為誰服務」的歡迎座談會。會中楊達結合自身經

115 《台灣民聲日報》「新綠」139期，1949.02.08。

116 藍博洲，〈陣陣春風吹麥浪——張以淮的證言〉，《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頁55。

117 參考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1988），頁173-174。

歷，闡述了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必須反映人民心聲的理念，還即興朗誦詩歌一首。可惜當時在現場的麥浪領隊，同時也是台大自聯會主席的陳實（後逃回大陸，改名方生），以及隊員林達文兩人都僅記得最後的內容為：「麥浪、麥浪、麥成浪；救苦、救難、救飢荒。」¹¹⁸根據報載，會中並針對「王大娘補缸」之舞蹈提出討論，結論它係民間舞蹈，「獨具樸實無華的風格，不能與一般貴族的狐步或華爾滋舞等同日而語」，¹¹⁹區別了麥浪歌詠隊的民間性與社交舞蹈貴族性的不同。

15日，楊逵發表〈介紹「麥浪歌詠隊」〉，向台南文化界推薦即日起麥浪在當地展開的表演。¹²⁰文章起始，楊逵就開門見山地推崇麥浪的口號「從人民中間來，到人民中間去」不但是正確的路，也是新文藝該走的路，接著又說：

「麥浪歌詠隊」這一次的表演是把全國各地（如西藏，新疆，東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歌民舞介紹給我們的，當然不是創作，可是這正如播種的人們一樣，為開拓台灣人民文化是很有意義的，由這個鼓勵很久很久被大家忘記了的真正的人民思想與感情的純真，樸素與活潑的表現，形已使大家重新關心起來了。（中略）

這是人民文化的開拓，只有堅忍耐勞耕耘，播種，光明才能來臨。¹²¹

由此可見，楊逵之所以熱烈支持麥浪歌詠隊，無非因其演出的曲目以來自民間的歌舞為主，藉由民間文化的形式傳遞人民的感情與思想，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而這確實符合楊逵社會主義者文藝大眾化的想法，也與他當時積極提倡重建台灣新文學的理念相合。

當年參加與麥浪歌詠隊成員座談的蕭翔文曾經表示：後來楊逵熱衷於民謠的創作，可能即是有感於民謠的演出在啟蒙大眾思想及改善社會風氣方面，有其不可忽視的力量。¹²²拘繫綠島期間，楊逵確實有多篇文章強調民間文學

118 以上論述係綜合參考方生，〈楊逵與台灣學生民主運動〉，《新文學史料》（北京），頁68-71；以及〈陣陣春風吹麥浪——張以淮的證言〉與〈一生漂泊兩岸間——林達文的證言〉，《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頁54-55及頁187-190。

119 見〈台大麥浪歌詠隊在台中市演出觀眾擁塞〉之報導，《中華日報》，1949.02.11。

120 楊逵發表〈介紹「麥浪歌詠隊」〉的2月15日起，麥浪歌詠隊一連三天在台南的南都大戲院演出四場。見〈台大麥浪歌詠隊今起在本市演出 本市文化界舉行歡迎會〉，《中華日報》，1949.02.15。

121 引自《中華日報》「海風」397期，1949.02.15。

122 參考蕭翔文，〈楊逵先生與力行報副刊〉，林亨泰主編，《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頁85。

與民歌民舞的重要性，諸如對於人民生活的意義、民眾心聲的自然流露，及所具備的戰鬥性等方面都有所闡發；¹²³同時他也勤於收集記錄台灣各族群的諺語、歇後語，以及民間歌曲等民間文學，又自創〈房子失修〉、〈一陽來復〉等歌謠；¹²⁴以及在中文劇作〈赤崁拓荒〉、〈勝利進行曲〉、〈光復進行曲〉、〈豐年〉裡多次穿插〈駛犁歌〉、〈四季紅〉、〈思想起〉等民歌民舞，¹²⁵以大眾耳熟能詳的民間樂曲加強情境的塑造。但事實上，楊逵在麥浪巡迴演出之前即已開始進行母語歌謠的收集與寫作。以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說，楊逵戰後的第一篇台灣話文歌謠發表於1948年8月2日，詩題為〈台灣民謠〉，內容是敘述李鴻章簽約割讓台灣給日本，以及台灣人自行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反抗日本的相關歷史。隨後楊逵又創作了多篇批判當前政治現實的簡短歌謠，陸續發表於《台灣新生報》「橋」副刊、《台灣力行報》「新文藝」欄與《台灣文學叢刊》，也在自己創辦的《台灣文學叢刊》第三輯（1948年12月15日發行）中收錄了來自民間的〈農村曲〉。¹²⁶甚至早在1947年初，楊逵就有出版《謝賴登歌集》、《陳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之計畫，然因二二八事件入獄而中斷。由此可證，楊逵創作台灣話文歌謠與蒐集民歌謠諺，並非來自麥浪歌詠隊的影響；然而相信當年麥浪歌詠隊普受民眾歡迎一事，還是促使楊逵體驗到音樂強大的感染力，並印證了民間歌謠啟迪民心的教育意義。

123 例如楊逵綠島時期文章〈諺語與時代〉、〈談諺語〉、〈春天就要到了〉、〈談街頭劇〉等，都在提倡民間文學或民歌民舞，這些文章均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

124 楊逵以小筆記本收集記錄的民間諺語和詞曲集，及其個人之詞曲創作成果等，均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謠諺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0年）。〈房子失修〉、〈一陽來復〉等自創歌謠收於「謠諺卷」，頁224-228。

125 詳情請參閱拙著，《楊逵及其作品研究》，（台北：麥田，1994），頁175-179。

126 〈農村曲〉與陳達儒作詞、蘇桐作曲，至今仍流行不墜的台灣同名歌謠第一段內容相近。黃哲永的民間採集與研究顯示：陳達儒所作歌詞係引早期民歌為藍本，再予以潤飾而成。韓嘉玲編著的《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也曾引用首段歌詞幾乎相同的〈農民謠〉，可見叢刊所收應為民間的集體創作，因此在別處出現時有〈農村曲〉或〈農民謠〉的不同名稱，內容亦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參見黃哲永，〈嘉義沿海地區歌謠特色初探〉，胡萬川總編輯，《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155-156；韓嘉玲，《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頁69。

八、結語

1945年8月15日戰爭結束之後，楊逵立即著手建立自己的組織，從參加解放委員會到領導新生活促進隊和民生會，定期輪值台中圖書館協助民眾教育之推廣等，無不是為建設新台灣而積極投入社會改造與新文化運動。1946年，楊逵與昔日左翼運動戰友組成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藉由紀念先烈及其遺族之撫恤，為日治時期抗日左翼分子進行平反，以台灣人民的立場重建台灣歷史，自主性地進行去殖民化的行動。另一方面，從楊逵參與籌組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編輯《一陽週報》以介紹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情，到加入政治建設協會台中分會與省內外左翼勢力結盟之台灣評論社，以及發表〈傾聽人民的聲音〉呼籲陳儀政府重視民眾真實的心聲，〈為此一年哭〉所表現對新政府統治不當的失望悲痛之情，〈阿Q畫圓圈〉諷刺陳儀政府失信於民，清楚傳達楊逵原先以無比歡欣鼓舞之情歡迎國民政府的接收，熱情散播三民主義與孫文思想，終至在二二八事件中步上武裝反抗之路，爭取台灣人自治的心境轉折。縱使因此曾有瀕臨死亡的恐怖經驗，並因而繫獄近四個月之久，出獄後的楊逵仍舊不屈不撓，用實際行動支持麥浪歌詠隊「從人民中間來，到人民中間去」的理念，企圖藉由民間歌舞的現實主義精神，達到啟蒙民眾團結追求自由民主的最終目標。

1949年楊逵與外省文友組織文化界聯誼會，希望藉由彼此的精誠合作，消除二二八事件以來不同省籍間的歧見，緩和本省與外省籍人士間感情的對立，並由楊逵起草〈和平宣言〉，油印20多份，寄給關心的朋友。這份宣言之所以名為「和平宣言」，在於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和平」二字——請政府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實施地方自治，並呼籲防止大陸上的國共內戰波及本省；希望在和平的基礎上，建設台灣成為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的示範區，充分表現楊逵對理想社會的熱切追尋。當時上海《大公報》的記者正巧來訪，從《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歌雷（本名史習枚）處看到，隨即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刊載在1949年1月21日的《大公報》上，¹²⁷標題為「台灣人關心大局 盼不受戰亂波及 台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不料這篇內容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

127 楊逵回憶多次提及這件事的始末，例如〈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二二八事件前後〉，參見《楊逵全集》「資料卷」，頁75、92。

短文，竟觸怒了即將走馬上任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1949年4月6日凌晨，當局對左翼人士展開大逮捕行動，楊逵再度被捕，從此被隔離封鎖於監獄長達12載，文學活動亦因之被迫再度中斷。距離戰爭結束短短不及四年的時間，台灣民眾對新時代的深切期盼也在高壓統治下走向幻滅。

日治時期因〈送報伏〉（〈新聞配達夫〉）成名以來，楊逵作品的特色即是鑄鑄了農民運動的經驗與社會主義的理念，試圖喚起民眾共同對抗壓迫階級。戰後初期政權遞嬗與政經局勢劇烈變動中，台籍作家直接介入政治者不乏其人，楊逵所參與的社會運動與政治活動標誌了台籍菁英追求台灣人自主的奮鬥歷程，以及戰後面臨「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之際，堅持台灣認同與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立場。若與楊逵當時投身《新生報》「橋」副刊台灣文學重建論爭，積極推廣描繪台灣社會現實的文學兩相對照，不難發現楊逵分別在政治與文學兩個領域，徹底實踐了他一貫從台灣人民階級出發的社會主義理念，以行動書寫了文學家與社會改革者緊密結合的台灣史頁，具體彰顯了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對抗統治階級壓迫方面的特殊性格。然而正因為關心台灣社會的發展與台灣人民的福祉，楊逵的文學生涯終於因身繫囹圄而遭受重大挫敗，由楊逵引發的台灣文學重建論爭也在同一時間被迫中止，而這無疑又驗證了台灣新文學運動擺脫不掉政治干擾的宿命。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方生著，〈楊逵與台灣學生民主運動〉，《新文學史料》（北京），2001.02。
- 王世慶著，〈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二二八事件（初探）〉，《史聯雜誌》21期，1992.12。
- 古瑞雲著，《台中的風雷》（台北：人間，1990.09）。
- 史明著，《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草根文化，1998.04）。
- 池田敏雄著，廖祖堯摘譯，〈戰敗後日記〉，《台灣文藝》85期，1983.11。
- 吳新榮著，《吳新榮回憶錄》（台北：前衛，1991.06）。
- 吳濁流著，《無花果》（台北：前衛，1988.08）。
- 吳濁流著，《台灣連翹》（台北：前衛，1988.09）。
- 周夢江、王思翔著，葉芸芸編，《台灣舊事》（台北：時報文化，1995.04）。
- 林亨泰主編，《台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彰化：台灣磺溪文化學會，1995.06）。
- 林梵著，《楊逵畫像》（台北：筆架山，1978.09）。
- 胡萬川總編輯，《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06）。
- 桃園林照像館攝影，《新竹縣忠烈祠奉安典禮紀念留影》（新竹：不詳，1946）。
-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戰後）》（台北：遠景，1981.10）。
- 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8.02）。
- 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12）。
- 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台北：前衛，1988.09）。
- 陳芳明編，《台灣戰後史資料選一二二八事件專輯》（二二八和平促進會，1991.03）。
- 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1994.04）。
-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1994.11）。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年7月至2001年12月陸續出版
- 曾健民、橫地剛、藍博洲合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4.02）。
- 黃惠禎著，《楊逵及其作品研究》（台北：麥田，1994.07）。
-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著，《台灣省新竹縣志》（一），出版者不詳，1976。

- 葉石濤著，《走向台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1990.03）
-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1995.04）。
- 路寒袖主編，《台灣文學研討會：台中縣作家與作品論文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12）。
- 劉捷著，《我的懺悔錄》（台北：九歌，1998.10）。
-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7.06）。
- 薛化元主編，李永熾監修，《台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 I（1945-1965）》（台北：業強，2001.04）。
- 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1988.06）。
- 鍾逸人著，《辛酸六十年（下）》（台北：前衛，1995.01）。
- 韓嘉玲編著，《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1997.01）。
- 藍博洲著，《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04）。
- 蘇新著，《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1994.05）。

二、論文

- 何義麟著，〈《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台灣史料研究》10期，1997.12。
- 何義麟著，〈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之建構——試析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7期，2000.01。
- 吳克泰著，〈楊逵先生與「二·二八」〉（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2004.02.02-03）。
- 陳翠蓮著，〈三民主義青年團與戰後台灣〉，《法政學報》6期，1996.07。
- 黃惠禎著，〈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台灣文學評論》4卷4期，2004.10。
- 黃惠禎著，〈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07）。
-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陳中原譯，〈楊逵的七十七年歲月——1982年楊逵先生訪問日本的談話紀錄〉，《文季》1卷4期，1983.11。
- 藍博洲著，〈秧歌·台北——台灣新文藝運動的青春之歌〉，《新文學史料》（北京，2001.02）。
- 藍博洲著，〈楊逵與台灣地下黨關係的初探〉（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2004.02.02-03）。

三、報紙

- 鍾天啟著，〈瓦寮寮裡的楊逵〉，《自立晚報》，1985.03.29。